

新时期

梁爱文 项晓敏 曲 莉 编著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创新研究

XINSHIQIMAKESIZHUYIZHONGGUOHUA
LILUNCHENGGUODECHUANGXINYANJIU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www.waterpub.com.cn

新时期

梁爱文 项晓敏 曲 莉 编著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创新研究

XINSHIQIMAKESIZHUYIZHONGGUOHUA
LILUNCHENGGUODECHUANGXINYANJIU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www.waterpub.com.cn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重点,从多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了分析。全书首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命题做了分析,然后从理论、实践和文化三个不同的角度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依据,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渐进传播和历史过程进行了讨论,随后深入探讨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另外本书还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其他视野,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要求,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讨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前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创新研究/梁
爱文, 项晓敏, 曲莉编著.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
社, 2013. 5

ISBN 978-7-5170-0913-9

I. ①新… II. ①梁… ②项… ③曲… III. ①马克思
主义—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43326 号

策划编辑:杨庆川 责任编辑:杨元泓 封面设计:崔 蕾

书 名	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创新研究
作 者	梁爱文 项晓敏 曲 莉 编著
出版发行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 1 号 D 座 100038) 网址:www.waterpub.com.cn E-mail:mchannel@263.net(万水) sales@waterpub.com.cn
经 售	电话:(010)68367658(发行部)、82562819(万水) 北京科水图书销售中心(零售) 电话:(010)88383994、63202643、68545874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和相关出版物销售网点
排 版	北京鑫海胜蓝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登峰印刷厂
规 格	184mm×260mm 16 开本 17.5 印张 427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3.00 元

凡购买我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的,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前 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清醒认识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解决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是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出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指导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同志是开拓者,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中,邓小平同志是开创者,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推进这一伟大历史进程,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推进到一个重要阶段。党的十八大的成功召开,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重点,从多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了分析。全书共计十二章。第一章为导论,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命题做了分析。第二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存在依据,从理论、实践和文化三个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论述。第三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沿革,主要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渐进传播和历史过程。第四章为毛泽东思想,主要内容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重大理论成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第五章邓小平理论,主要内容是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等。第六章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主要内容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内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党建理论的发展等。第七章为科学发展观,主要内容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与历史地位等。第八章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主要论述了十八大以来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第九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其他视野分析,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的中国化。第十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要求,主要从生态文明建设、党风廉政建设的角度来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十一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立足实际、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四化”相结合四个方面来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第十二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前景,分别从世情、国情、党情方面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前景。

全书由梁爱文、项晓敏、曲莉撰写,具体分工如下:

第二章、第三章、第八章第一节、第九章、第十章:梁爱文(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第一章、第四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项晓敏(山西体育职业学院)；

第五章至第七章、第八章第二节：曲莉(大连医科大学)。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些第一手资料，借鉴了国内外很多相关的研究成果及期刊、著作、论文等，在此对有关的学者、作者表示诚挚的感谢。当然，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局限，书中可能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所以，作者恳切地希望广大读者朋友给予批评、指正。

作 者

2013 年 4 月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1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追溯	1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8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特征	15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存在依据	22
第一节 理论依据	22
第二节 实践依据	30
第三节 文化依据	34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沿革	40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	40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渐进传播	49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	53
第四章 新时期对毛泽东思想的新审视	67
第一节 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轨迹	67
第二节 新时期对毛泽东思想的深刻理解与把握	70
第三节 新时期对毛泽东思想理论成果的重新审视和定位	71
第四节 新时期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83
第五章 新时期对邓小平理论的新解读	89
第一节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环境分析	89
第二节 新时期对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把握	94
第三节 新时期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98
第四节 以新视觉解读邓小平理论	101
第六章 新时期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把握	104
第一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与环境分析	104
第二节 新时期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内涵的新把握	108
第三节 新时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党建理论的发展	119
第四节 新时期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历史地位的探究	127
第五节 以新视觉解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129
第七章 新时期对科学发展观的新探究	132
第一节 新时期科学发展观形成的环境分析与研究	132

第二节 新时期对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的全面概述..... 143

第三节 解读新时期科学发展观的主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51

第八章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 157

第一节 十八大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要求..... 157

第二节 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168

第九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其他视野分析..... 170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170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中国化..... 181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 188

第十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要求..... 196

第一节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196

第二节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208

第十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222

第一节 始终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222

第二节 始终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231

第三节 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 235

第四节 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民族化、时代化、大众化相结合 238

第十二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前景..... 243

第一节 在世情发展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价值..... 243

第二节 在国情发展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价值..... 257

第三节 在党情发展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价值..... 263

参考文献..... 272

第一章 导 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渐次传入中国,被具有特殊国情、特殊文化、特殊群体的中国人民所接受。由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润物无声地开始了。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层面上的不断推进,在理论层面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逐步形成成为一门学问。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过程中,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具体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借鉴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精华,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独创性经验,概括出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积淀了丰富的内涵,体现出显著特征。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追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从提出到现实的展开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史演变过程。毛泽东在 1938 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但是党的七大之后,在党的重要文献以及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讲话和所写的文章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曾一度消失,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也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成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在学术研究中重新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并兴起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热潮。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重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反复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一、早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初步认识

19 世纪 40 年代马克思主义开始在欧洲流传。马克思主义创立之时,资本主义已经经过三百多年的历史发展,实现了大机器生产和工业化。正是在那样一种社会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了人类先进思想的积极成果,创立了唯物史观。根据这种历史观,他们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以及整个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20 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时候,当时的中国还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经济文化十分落后,正在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践踏和蹂躏。近代以来,我国的仁人志士为了改变国家落后挨打的局面,缩短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文化、科技之间长达数百年的历史差距,引进资产阶

级的社会学说和政治理论,企图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却发现此路不通。在这种情况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在20世纪之交到20年代末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称之为浅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时期主要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创建中国共产党,制定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政策,探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等,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但大革命最终还是由于种种原因而失败。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上局限于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消化和吸收,在研究当中,尚欠深入,在运用当中,过于照搬,所以效果不尽如人意。从操作层面来看,陈独秀犯了学究气、家长式、一言堂的错误,进而陷入“右”倾错误;瞿秋白与此相反,犯了初生牛犊不怕死的错误,即“左”倾错误。这些错误教训了中国共产党人,使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聪明起来。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初步传入与中国当时社会制度之间存在着历史差距,它不可能立竿见影的在中国产生影响。中国共产党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革命的思想武器来接受的。从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开始,党的最早的一批领导人就十分注意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具体问题。早在“五四”时期李大钊在同胡适论争时就曾指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哪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恽代英也指出:“寻求一个适合国情,而又合于共产主义的方针来”。当时也有共产党人在《新青年》杂志上撰文明确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现状连起来研究一下”的任务。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涉及了必须按照中国的特点来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谈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问题。

由于当时社会条件的不允许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党的一大前后,并没有立即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提出在中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在无形中表现为一种照搬十月革命的具体经验的倾向。党的一大以后,党在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不仅对中国社会具体情况的了解加深了,而且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的认识也加深了。1922年1月《先驱》创刊号就直接表达了探索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意向,其发刊词提出,“本刊的第一任务是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在事实上开始努力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了。正因如此,党的二大不仅坚持把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纲领,而且还提出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是:“(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二)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这已经初步揭示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良好开端。党的三大针对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决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与国民党开展合作。国共合作以后,由于参加革命的阶级成分十分广泛,革命形势变得异常复杂起来,为了适应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党的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还不可能真正地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但是他们一直都坚持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这为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认识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前奏

1930 年左右,中同共产党内一度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用现成公式来裁剪中国革命实际的教条主义错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同教条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坚持不懈地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败以后率领队伍向井冈山进军,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在总结革命根据地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对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作出了初步的论证。这些工作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怎样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这个新的课题。党内也经常围绕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发生各种争论,争论的问题主要“农村包围城市,还是城市包围农村”就这个问题争得一塌糊涂。这些争论不仅严重地妨碍着全党思想的统一,也极大地约束了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毛泽东敏锐地发现这些争论其实就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教条主义思想路线的斗争。因此,要统一全党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认识,首先就必须努力改造党内那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不良风气,在全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29 年红四军在福建古田召开党的九大,毛泽东在他起草的决议中,提出了如何纠正主观主义的问题。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告诫党员同志坚持调查研究,要求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量;二是毛泽东提出要教育党员用马列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这里,毛泽东已经初步涉及了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1930 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尖锐地批评了唯上、唯书的教条主义思想,首次划清了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的界限,从理论与实践、实际关系的角度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这些话都是有针对性的,闪烁着要从中国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和坚持独立自主的思想光辉,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原则已经基本确立了,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之为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先导。

但是,由于当时全党还没有中国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这一思想原则还不能够完全为全党所接受。这种状况一直到 1935 年的遵义会议以后才有了根本的改变。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明确提出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一个新起点。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共产国际领导方式的转变也从外部环境上为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可能。1935 年共产国际七大作出了关于“今后要避免直接干涉各党的内部组织的事务”以及“要避免机械地把一个国家的经验套用到另一个国家,避免用一成不变的方法和笼统公式去代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刚刚遭受过一次“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正在反思之中,而当时共产国际的威望仍处于高峰期,因而共产国际七大关于改变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决定对中国共产党所起到的思想解放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1935 年 12 月,瓦窑堡会议尖锐地批评

了党内“关门主义”不会把马列主义“活泼地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环境中去”，而把马列主义变成死的教条。1936年3月，张闻天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做的报告中提出，要将共产国际决议“民族化”，让其适应我国的社会环境。已实际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从1936年冬至1937年夏先后写出《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著作，一讲哲学，一讲战争，而主旨都是反对理论脱离实际、照搬书本和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不难看出，共产国际七大后，在中共文献中出现的“民族化”“具体化”的提法，已经与“中国化”的概念非常接近了。

1937年11月王明回国后继续执行教条主义路线，使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直接提上了议事日程。王明在12月9—14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虽然也讲到了坚持抗战、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正确意见，但他报告的重点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强调要“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在当时的条件下实际上就是要共产党去服从国民党。由于王明说他的报告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这就使得许多与会者产生盲目的信赖，一时不能明辨是非。许多人根据王明提出的很多错误的或片面的观点，检查总结过去统一战线工作的得失。但是，党的整个工作的大局，是在执行符合中国情况的正确路线的毛泽东等人掌握之中。为了克服各种“左”、“右”倾错误思想倾向对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干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已经是迫在眉睫了。曲折的进程、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中国共产党更清晰地懂得了应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对待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外国的经验。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进入更加自觉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新阶段。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到党的七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在以往多年奋斗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毛泽东相继发出号召：

“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中国共产党也要像列宁、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那样来工作；“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等，都在革命斗争和理论建设的实践中得到贯彻。与此同时，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艾思奇、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张如心、邓拓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也多次进行过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在党内广泛运用，其含义也在逐步扩展和深化。它的丰硕成果的集中表现，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建立。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历史的总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也产生了广泛的认同，并决定把它确立为中国革命的旗帜。1943年，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概念。他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接着，中央其他领导人也从不同角度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阐述，指出它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指导中国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1945年刘少奇在党的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则更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他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

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刘少奇的这个定义,指出了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关系。它以与伟大事业本身相匹敌的理论高度,出色地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总结。它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提供了此后界定毛泽东思想的范例。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的一度放弃

查阅毛泽东著作和有关材料可以发现,自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在公开场合已经很少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外,一般情况下更多的是使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样的提法。这一提法正式提出于1939年10月的《(共产党人)发刊词》,重申于1940年年初的《新民主主义论》,此后一直沿用下来,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外国经验问题上的标准用语。

尽管此后毛泽东一般不再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但由于已经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得到了党委领导人的确定,并且言简意赅、通俗明了,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经常出现在报纸、会议、刊物之上。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两种提法,是同时广泛使用的。这种情况到七大以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发生变化。编辑《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亲笔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论新阶段》报告的第七部分)一文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从此以后的30年中,几乎所有著作、文件、报刊文章等,都统一采用“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提法,不再出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字样。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提法为什么党和毛泽东会改变称谓呢?对于这个问题,很多学者作过考证,基本上都倾向于认为主要是因为当时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斯大林不同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当我们全面审视党面临的客观形势与主观认识,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党的七大后不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的原因。

一是迫于当时共产国际领导国苏联的压力。苏联共产党赞成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持保留态度。因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都没有讲过马克思主义要与本国的历史、文化相结合,没有讲过要使马克思主义要俄国化、民族化。1948年6月28日共产党情报局对于南斯拉夫的国内情况,谴责南共领导人的所谓民族主义,反苏和亲资本主义的倾向。对于南斯拉夫的情况,共产党情报局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谴责,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的警惕,中共必须小心谨慎,稍有差错,“民族主义”的大帽子就会被戴到毛泽东和中共的头上。1948年下半年,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这也意味着中共将面临依靠苏联的帮助,为避免苏联方面发生误解,中共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也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的表达形态——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二是缘于党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上的历史局限。无论是查阅党内领导人的讲话或是党内的重要文件,都可以发现20世纪90年代之前党内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既然“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两个提法已经在党内、国内的意识形态中站稳了脚跟,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让提也罢。

在一段时期内不再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并不意味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放弃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毛泽东一般的不再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但他还是反复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1956年4月4日,他在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时指出:“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两党争论时,毛泽东也曾经重新提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并明确地把它同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统一起来。尽管在一段时期内毛泽东和我们党不再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但毛泽东和我们党并不认为这一提法有什么错误,相反他们一直在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不懈努力。

另有一种观点,王令金同志在中央编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一书中将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期看作是歪曲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时期提出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都是不正确或错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时期,由于受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误入歧途。表面上高喊马列主义口号,实际上背离马列主义实质,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这种错误达到顶峰。即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左’的错误也未得到彻底纠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依然处于误区之中,所提出的一些理论观点,还是脱离实际并带有错误的倾向。”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重提

从已发表的邓小平著作看,新中国成立后,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一直没有用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但是,他也一直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明确提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伟大实践。邓小平领导我们党坚定不移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作出新的论断。在这一过程中他领导我们党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使共产党人始终注重总结历史的和现实的、中国的、国外的、成功的、失败的经验教训,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的启示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通俗并更带有中国特色的概念,被理论界在学术研究中重新使用,并广泛传播开来。面对新时期出现的新问题,不仅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问题凸现出来,而且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问题也凸现出来。江泽民在领导我们党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他不仅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且还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代和世界形势的新发展、新变化相结合。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分别在党的十五大、十六大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以后,学术界更掀起了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高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开始频繁出现于学术研究、党的文件和党的领导人的讲话中。

从我国的历史资料、党的文献上看,2000年以前基本上使用的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或与此类似的提法。2001年9月26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要求“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2001年9月在中共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到2003年7月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的讲话、12月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到2005年上半年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的讲话和在陈云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再到在2007年11月党的十七大上的报告和2008年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胡锦涛多次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进行了精辟的阐述。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命题,并将其作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首要任务。

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时代、列宁时代不一样,同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也不一样。我们正处于新世纪新阶段,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迫切需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作出理论的回答。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胡锦涛同志向全党明确提出了继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任务。2003年12月26日,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继续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他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理论创新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可见,胡锦涛重新使用和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非偶然,而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胡锦涛不仅提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任务,还指明了在当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和方向。

正是建立在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又进一步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进一步推进了和推进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进一步显示了和显示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伟大的和无比旺盛的生命力。

王令金同志在中央编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一书中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是继续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这一时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国两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推动了中国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随后,大张旗鼓地开展拨乱反正工作,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同时实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些工作本身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新步入正轨,并为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重新认识中国的国情,

即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重新制定党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重新描绘中国的发展蓝图,即小康社会和四个现代化,等等。这一切,进而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他还认为,迄今为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四大正确的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是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概括出来的。这一命题的提出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多年探索和思考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探索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产物。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具体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独创性经验,同时借鉴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概括出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的内容具体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也意味着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具体论断与中国具体实际不相符合时,决不能生搬硬套,而必须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立足于解决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中的新矛盾、新问题,实事求是地提出新观点,拿出新办法,才能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向前推进。毛泽东曾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

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讲过农村包围城市,从来没有讲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应用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一般原则具体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从分析和综合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中国的特性,即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作为世界性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只是基于历史发展大势分析而形成的“总的指导原理”,它讲的是普遍真理,是认识工具,是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一般方法论原则。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他又说:“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 and 政治条件。”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在中国一定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实际应用中具体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可行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否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就不可能起任何作用。中国要搞社会主义,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没有也不可能找到现成的答案。

在清朝晚期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经济和文化都比较落后。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会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仅靠马列主义的一般原理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经验去改革,是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同样地,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更无法照抄别人的经验。要真正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必须紧密地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寻找适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从而用“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具体行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理论基础。没有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是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密不可分的,离开实践这个主渠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无从谈起。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不断取得丰硕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是基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发展,始终与重大现实问题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是扎根实践、面向时代的科学理论,其本质是从人们现实的实践活动出发,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石建立的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自登上历史舞台以来,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与实现民族独立、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紧密结合,在探索回答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大现实问题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只有把重大现实问题作为基本切入点,才能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供客观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不仅需要在薪火相传中获取历史依据和理论依据,更需要在与现实生活的互动中探寻实践依据和时代依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实质上就是国情基础、时代背景、人民利益,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成果具有科学性的客观依据。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时代特征、人民需求相结合,才能够不断得创新发展理论。重大现实问题是社会实践内在矛盾的外部反映,是影响发展进程的关键环节,是客观依据的集中体现。抓住了重大现实问题,也就抓住了理论研究的着力点、实践探索的关节点和知行统一的落脚点。

实践呼唤理论发展,理论指导实践进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紧紧抓住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深入研究分析这些重大问题在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具体表现和发展趋势,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产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客观基础。只有把重大现实问题作为基本切入点,才能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供强大动力。

二、提升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为理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是中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运行后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

许多具有独创性的实践经验,通过对这些经验的总结和提炼,就会创造出新的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要包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从而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切入点推进理论发展,是对民族期待的真切回答,对时代呼唤的真实回应,对人民需要的真情回复。对这种回答、回应和回复的科学理论概括,就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创新的历史性成果。

毛泽东曾经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了解和懂得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的特点、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达到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践完整、统一、深入的理解和把握。

1941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曾经说:“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①这句话不仅要研究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各个时期的实践,而且要研究如何把中国人在各个时期所积累的实践经验加以概括、总结和提炼,使其成为既合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融进了丰富中国经验的新的理论性创造。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带有独创性的经验,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对这些经验的总结和概括,把丰富的实践提高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成果,不断推进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历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又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建设创新型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继续推进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又增添了新的内容,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材进课堂进头脑。”^②这个进程还在继续,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还会在新的实践中取得新的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之间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在“十八大”以来的理论创新,虽然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历史任务,有着各自产生的历史条件、各自的针对性、各自的理论侧重点以及各自具有时代特征的内容,但是,它们都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它们都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共同的精髓;它们都坚持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始终坚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必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347页

② 胡锦涛,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政府工作报告——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2012-11-8